

讀書與出版

新形勢和新認識

鄒彥

康有爲與戊戌維新

胡繩

關於蘇聯幣制改革

文麟

錢亦石先生在工作隊中

何家槐

英文的學習問題

胡仲持



第三年

· 版出日五十月一年七十三 ·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筆談 (二)

新形勢和新認識 鄒彥 (一)

聯合國與民主和平 (時事特講) 梅碧華 (六)

· 從人物看近代中國 ·

康有為與戊戌維新 胡繩 (二)

『頭髮的故事』 (國文班第五回) 孫起孟 (一六)

· 蘇聯文學講話 (七) ·

反映在蘇聯文學中的偉大衛國戰爭 戈寶權 (一九)

問 關於蘇聯幣制改革 (共四問) 文麟 (三)

胡佛的對德單獨媾和計劃是怎樣的? 貝遜 (三五)

答 魯爾問題為什麼如此重要? 貝遜 (三六)

錢亦石先生在工作隊中 (其人及其著作) 何家槐 (二三)

柯爾先生說錯了 (國際文化風景線) 柏國 (二六)

書 讀『中國經濟原論』 哲奇 (三七)

十二顆星 聞枚 (三八)

評 書市散步 懷葛 (四〇)

燕大翁獨健先生講三十年來蘇聯的史學界 (文化通訊) 懷勵 (四〇)

通俗化·庸俗化·舉例子 馬特 (四四)

· 學習之話 ·

英文的學習問題 胡仲持 (四八)

關於人類進化疑點之答覆 (信箱) 建人 (五三)

簡覆 (共六則) (五五)

回家 (習作·小說) 李華 (五八)

封面·拉布雷的『巨人世家』插圖 (G·陀萊作)

LIFE PUBLISHING CO.
4 Lane 384 Foochow
Road Shanghai
54 Queen's Road C.
HONG KONG
40 A Cross Street
Singapore

店書活生 者行發

路州福(區一十) : 海 上
號四弄四八三 : 港 香
號四五中道后皇 : 港 香
A號十四街富吉 : 坡 加 新

版出書讀

期一第·年三第
· 版出日五十月一年七十三 ·
· 者 輯 編 ·
社刊月版出與書讀



新形勢和新認識

鄒彥

形勢往往走在思想的前面，到一定階段時，舊形勢所形成的舊思想方法就會逐漸地失去效用，難以適用於新的形勢；這就要有勇氣來把舊的思想方法提升到新的階段，才能正確地認識新的形勢，從而推動這新形勢向進步的方向發展。

戰後的緊張的一年——一九四七，已經過去了。在這一年中，整個世界的形勢已經起了巨大的變化，截然地把戰後的發展劃分了兩個性質不同的階段：業已過去的是消極的「團結以求和平」的階段，今後的是積極的「鬥爭爭取勝利」的階段。面臨着這新舊形勢轉換的我們，是不是思想上已經隨着形勢的發展而跟着發展了呢？這是我們每一個人今天應該好好檢討一下的一個問題。

要了解這新舊形勢的形成與轉換，我們必須首先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發展中去追尋它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反法西斯的進步的戰爭，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與資本主義的英美等國共同反對德日意法西斯國家的戰爭。在這戰爭中，盟國間的團結是勝利的非常重要的條件；「團結統治一切」是戰時國際形勢中的一個主要特點。戰時盟國之間的巨頭會議一次又一次把戰爭有力地向勝利推進。在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每一次三巨頭的歷史性的會議，都解決了不少的問題，每一次都象徵着勝利的進軍。一個個代表着歷史焦點的地名，是那樣愉快而深刻地烙印在每個人的腦子裏，至今還讓人念念不忘當時這些會議所帶來的興奮。

當戰爭勝利結束以後，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所面臨的主要任務，自然是保證國際的民主和平，以鞏固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由於因襲着戰時的「團結統治一切」的思想，團結以求和平，就自然成了達成任務的主要方法。一般對於盟國上層的團結和會議始終寄予極大的期望。

然而，戰後的世界却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在一天天破壞團結，分裂世界，使以團結求和平的思想和方法一天天不再適用。這個因素就是美帝國主義的世界擴張政策。



元旦試筆

元旦試筆，老例應該說些吉祥悅耳的話，但在到處充滿了「什麼什麼危機」的今天，實在不能再有什麼善禱善頌的了。

記得年青時曾看到「倉頡造字，東神夜哭」的傳說，覺得煞是奇怪：鬼神爲什麼夜哭呢？請教過幾位老師，也都得不到明白的解答。有人說：天機不可洩漏，有了文字便保持不了祕密，對於鬼神不便，所以要哭。然而，鬼神也者不是所謂二氣之良能嗎？不是說「聰明正直之謂神」嗎？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大抵，都像這樣的說不通。

後來知道：文字的發明和火的發明一樣，是人類進化途中的大事之一，要把它描寫得「驚天動地」，所以古人那麼傳說了。並且知道，文字的創造，不是一人的事業，所謂鬼神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整個世界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一方面是蘇聯的空前強大，中東歐許多國家建立了新民主政權和實行了廣泛的民主改革，以及各國民主力量的不斷增長，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列強的削弱，祇剩下一個美帝國主義在戰爭中益發膨脹了起來，而在它內部正孕育着可怕的經濟恐慌。現在美帝國主義擔任起了全世界反動力量總指揮的角色，撕毀戰時盟國間種種莊嚴的協定，庇護德日法西斯殘餘，手握原子彈和金元，向全世界不遺餘力地推行其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而且它做這一切，是利用了戰後各國普遍貧窮的現象，利用了世界人民普遍要求團結和平的心理，把它的侵略行爲都隱藏在種種巧妙的名目之下的。比如明明是在別人國內製造內戰，它却煞有介事地說在「調停」內戰；明明是在破壞別國的主權，侵犯人家的獨立，它却假仁假義地說是「援助」別國；明明是在進犯世界人民以實現其世界霸權的妄想，它却處處無恥地放出「反蘇」和「防禦」的烟幕。然而，兩年來，在蘇聯、新民主主義國家以及各國人民的不斷阻擊之下，美帝國主義的這種世界擴張政策，就一天比一天感到棘手，因而也就不得不一天比一天將其凶暴侵略的真面目暴露出來，到三月十二「杜魯門主義」和隨後「馬歇爾計劃」公佈以後，對這點已絲毫不容懷疑了。

在民主的這一面，兩年來，蘇聯與新民主國家都是民主和平最堅決的捍衛者，因此給與美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抵抗也最堅決。在其他諸國，雖然民主勢力同樣在抵抗美國的侵略，然而因爲本國反動勢力做着美帝國主義的直接工具，美帝的擴張政策始終有力地影響着這些國家的局勢。特別是因爲這些國家的右翼社會民主黨的日益投降美帝，而左翼民主勢力未能及時地認識這新的形勢，揭露并批評這種反動的新結合，依然把自己拘束在舊統一戰線方針裏面不敢放手鬥爭，於是使得美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內多少獲得了一些成就，最具體的表現就是五月裏法義兩國共產黨的被排斥出閣。特別是從一九四七年三月以

也者，也是烏有先生之類。於是，也就「理得心安」，不再去「尋根究底」了。

不知怎的近幾年來，那個老問題又時時像一抹輕煙似的兜上心頭。大概因為文字在使用上出了毛病：說謊話的得到鼓勵，說實話的受到災難，——這一連串的現象，自然要使人發生異樣的感覺，尤其是靠拿筆桿生活的人，當他感到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而又不能讓他痛痛快快地吐掉的時候。這種情形，或許「古已有之」，因而返映成為那樣的一個傳說吧。

如果，元旦非說點吉利話不可的話，那末我就希望普天下沒有方法不和文字打交道的朋友，以後漸漸少看到連篇的鬼話；必不得已而非看不可時，就請從那反面或者挾縫裏去了解它！（素）

把過去作一個結算

在這一個社會裏，有一些人，祇許製造黑暗與施行壓迫，却不許別人

來，配合着這些國家內部反動派和投降的中間份子的出賣與合作，美帝國主義對這些國家人民的攻勢，已經嚴重地分裂了這些國家，使這些國家的民族利益與獨立受到威脅和損害。就全世界言，美帝國主義的攻勢已經分裂了世界，已經日漸打破了與美帝講團結以求和平的幻想。這樣，特別是在奴役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唱出來以後，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和反帝國主義民主陣營互相對立的局面已經日益明顯，每況愈下的國際會議也逐漸成了只是悲觀的源泉，呈現在面前的是帝國主義與反帝人民更加尖銳的鬥爭新形勢。總結了這兩年來世界大局與鬥爭經驗并闡明了新形勢與新方針的，就是九月底在華沙所公佈的宣言。

這篇劃時代的宣言，毫不含糊地指出，由於美帝擴張政策強制執行的結果，世界已經劃分為一個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領袖的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陣營。并且在檢討過去時特別強調地指出，工人階級最大的危險是在過低估計自己的力量，與過高估計敵人的力量。這宣言可以說結束了世界人民過去對帝國主義所取的守勢，同時展開了世界人民向帝國主義進攻的新形勢。在這新形勢下面，舊日的「團結以求和平」的方針已不再適用，客觀事實已日益證明，祇有鬥爭，才能壓制帝國主義的兇鋒，才能真正確保和平。

最典型地反映着這轉變的要算是西歐的法義兩國，特別是法國。檢閱一下法國民眾陣營的自我檢討和以新方式展開的新攻勢，我們不難看出全世界人民鬥爭的新方向。

法共領袖多烈士在十月廿九的政治報告裏就勇敢地承認，法共過去在策略上是犯了一些錯誤的；而「這些錯誤的根源，在於（法共）中央委員會對國際形勢的變化的性質及規模，特別是對美國領導下的，為了美國利益的，帝國主義和反民主力量的重新結合的性質及規模，認識得太遲，明確的闡明也太遲。」

有一些不平。差不多所見的社會情形一向就是如此。當然不止我一人如此，許多人所見是相同的。

但是想把這種情形作一個簡單明瞭的說明却並非易事。幸虧不久以前看到許季轍先生發表出來的魯迅給他的信（見二卷六期「時與文」），有一封裏會說着這樣的幾句話，是關於我的：

「喬峯（指我——建註）事蒙如此鄭重保證，不勝感荷。其實此君雖頗經艱辛，而仍不更事，例如與同事談，時作憤慨之語，而聽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語，但撥彼語以上聞，藉作取媚之資矣。頃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於餒，三緘厥口，以後庶免於咎戾也。……」

又一段裏云：

「近日刊物上常見有具名「建人」之文字，不知所說云何。而且稱此名者似不祇一人，此皆非喬峯所作，顧亦不能登報一一更正，反致自擾也。……」

此皆說明講話或寫文章以鳴不平都如何容易得咎！文章上具名「建

這樣，法共就「沒有從開始時起，即用一切必要的力量，強調我們（法共）被排斥出政府，是由於美國反動派的命令。」「繼此最初的錯誤之後，我們（法共）沒有一開始就無情地揭露社會黨領袖和政府中其他黨派的行為，指出它是明顯的卑鄙的行為，是對民族利益的可靠的背叛。結果，我們（法共）在國民議會中的集團表現出猶豫和動搖。」

多烈士更進一步指出：「中央委員會及議會集團的猶豫，在一定限度內，妨礙了迅速動員工人羣衆和民主人民起來反對拉馬迪政府和它的災難政策，助長了中央委員會在上個月所指斥的機會主義傾向，這傾向表現在對工人階級的力量估計過低和害怕羣衆運動。」

這些錯誤表現在事實上就是，在法共領導下的法國民主運動過去一直死板地被侷促在合法鬥爭的範圍以內，爲了顧全團結，往往還限制羣衆運動的發展，名爲中間實爲投降賣國的右翼社會黨人士在羣衆中所起的混亂作用沒有及時有效地予以抵制，美國直接指揮下的法西斯勢力就得以乘機抬頭。其結果就形成了十月市選的局面，雖然法共依然擁有全國百分之三十一的選票。

因此，經過深刻的檢討之後，法共得出一個不可動搖的結論：「爲了團結一切勞動人民和共和份子，保衛他們的直接利益和自由權利，爲了抵抗法西斯主義的新攻勢和保衛法蘭西的獨立，我們必須更加依靠羣衆。」他們重新整頓了統一戰線的陣容，并且從民族陣綫的經驗中，發現團結和組織人民羣衆行動的新方式。

也就是在這樣一個新鬥爭方式的號召之下，不堪於經濟災難的法國人民羣衆，以十一月十二日馬賽罷工爲號角，展開了對反動政府的攻勢，揭起了要求生存，保衛勞工，和平，民主，與民族獨立的大旗。經歷了一個整月的鬥爭，罷工的浪潮捲遍全法，參與鬥爭的人民最多時會達四百萬的數目。儘管反動政府實行法西斯的武力壓制，而且公開勾結美帝國主義以內戰來威嚇人民，壯大

人」者確實不祇一人，還記得有一位名建人者專寫討論教育的文章。十六七年前魯迅寫此信前，有一期內的幾篇文章可能確實非我所寫，然從這一聲明裏可以看出這黑暗的社會裏壓迫是如何明白與嚴重了。

若說到我自己以外：

梁仁達被活活的打死，兇手辦罪不？

徐大毛在古拔路上被捉去，居然被判了罪！而且以後原來的工廠不要他，別的工廠也不要他！

于子三怎樣死的？一片或幾片玻璃片究竟是否能自割而死？檢察官說「尙屬相符」究竟是否相符？

這是僅僅在有關司法方面，不假思索，浮泛腦海中的一點點事情，他們所受的害比我更大得不知多少！

所以就是僅僅爲了生存，也非衝破黑暗，求得光明不可了。現在舊的一年已經完結了，且看新的一年怎麼樣！（建）

的人民隊伍却始終不屈不撓，迫使舒曼政府終於對工人的要求作了讓步，雖然法國人民的要求并未得到全面的滿足。法國人民攻勢的這個勝利具有特殊重要性，因爲它輝煌證實了，更加依靠羣衆，放手進行羣衆鬥爭，的確是今天這個新形勢下所需要的，而且必然能够戰勝帝國主義及其奴才的正確方針。在意大利，同樣的鬥爭完成了同樣的勝利，更增加了這個真理的輝煌。法意的鬥爭與勝利，還不過是一個開始，一個光輝的楷模，在未來的發展中，同樣的情形必然將出現於許多受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裏。

所以，很明顯的，舊的形勢已成過去，消極的以團結求和平已經不發生效力了。新的形勢需要新的鬥爭方式，而這方式不僅已經從世界人民的經驗中創造出來，而且其正確性已經開始爲事實所證明，那就是更加依靠羣衆，放手進行鬥爭。在未來世界局勢的發展中，這將是一個主流。決定一切的將不是巨頭的會議，而是羣衆自己的行動。如果我們的思想已經隨着新的形勢而提高，那我們就不會因什麼外長會議的決裂而悲觀，就不可能爲帝國主義的紙老虎所嚇倒；我們對民主人民勝利的前途，就一定有更高的信心。

了解現世界的幾本必備的參考書：

世界政治手冊（增訂本）	陳原編著	一〇・〇〇
戰後資本主義經濟之變化	瓦爾加著 吳清友譯	一五・〇〇
新歐洲	福斯特著 貝遜譯	六・五〇
第二次世界大戰小史	吳湘漁著	排印中
蘇聯的民主	英・斯隆著 韜奮譯	一二・五〇
工黨一年	費孝通著	七・〇〇
論印及反帝鬥爭	王任叔著	三・〇〇

生活書店發行

新聞自由一例

那年，威爾基到了重慶，他看見一家商店門口集攏了許多市民，都伸着捏住鈔票的手，在吵嚷，在擁擠。住在那個城市的人們都知道這是搶購平價布的。

「這是幹什麼的？」威爾基問。

「……唔，」陪坐在汽車裏的某博士遲疑了一下說：「這是獻金的！」

×

上月初，蘇聯政府宣布改革幣制，人民羣赴銀行解入其所貯藏的鈔票。美國駐在莫斯科的外交人員誤認為發生「擠兌」。於是興高彩烈地回報華盛頓，副國務卿羅凡特對記者發表談話，「美國之聲」電台用廿三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說是蘇聯的經濟危機來了。

×

這兩段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前者還祇是欺騙了一個人；而後



聯合國與民主和平

梅碧華

他們慶賀的太早了

檢討這一年來的國際形勢，許多胆怯的人們以為美國帝國主義者是勝利了。是的，帝國主義者正在高奏他們的凱歌，他們正在為新的戰爭陰謀進行肆無忌憚的準備。這不像是一個和平的時代，而是另一次戰爭的前夜。他們得到某些國家的法西斯份子，殖民主義者，獨佔資本家，沒落的王朝，以及偽裝的社會主義者的幫助，使美國帝國主義者掃除道路上的障礙，不顧羞恥地歡迎美國去作自己的主人。沒有信念的人們，屈服了的人們，借用外力維持反動統治的人們，都匍伏在法西斯的長統靴下頂禮膜拜起來了。

但是，他們慶賀的太早了。他們

的勝利是建築在沙坵上的勝利，他們的勝利是海市蜃樓的勝利，最重要的，他們的勝利還是得不償失的勝利，是一個為他們自己帶來失敗的勝利。他們——美國帝國主義者，在自己的國內聽到了憤怒的吼聲；他們侵略希臘，希臘人民憎恨他們；他們控制了一半的朝鮮，朝鮮人民仇視他們；他們霸佔着日本，日本人民認識了這個擴張主義者；他們分裂德國，德國人民看見了希特勒生前的舊友；他們在流一個亞洲大國人民的血，這裏的人民爆發着不斷的抗議；他們以金元威壓歐洲，整個歐洲人民詛咒着干涉者的名字。

世界人民真正的民主勢力是足以制止發動一次新的戰爭的。我們不必顫慄，不必憂心，沒有一種力量可以

者却是向全世界行騙了。可惜這個騙局馬上被拆穿。美國一點不怕羞恥，因為它是提倡「新聞自由」的國家。提起美國的「新聞自由」，那真是又好笑又可氣的。維辛斯基控訴戰爭販子，抨擊戰爭宣傳，美國却答以「新聞自由」，「發表自由」，「言論自由」。然而，這「自由」卻是如此狼狽！

在美國，這種例子是舉不勝舉的。特別是在反蘇大為時髦的今天。新聞記者，外交情報員，議員，將軍，著作家，官吏都以製造和散播一點謠言為最大的快事。因此，我們又想起西蒙諾夫的那本名劇「俄羅斯問題」了。想來，那羣美國人是不歡喜這本書的，他們會說這是「宣傳」。然而你們假如不是戈培爾學院的高徒，怎麼會造出這「蘇聯經濟危機」的傑作來呢？（碧）

美國人的性格

費孝通著

定價三元二角

生活書店出版

把前進的時鐘撥向後方。從宣傳戰爭到發動戰爭，當中還有一段漫長的時間。這時間應該掌握在人民的手裏，而不是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

和平決議在人民之間生根

因此，我們相信作為和平機構的聯合國組織，在本屆大會中通過了譴責破壞和平，鼓勵要求和平，以提高國際友誼的決議案，應該是最重大的政治成就。這決議雖然是很含混的，與蘇聯的原提案也大不相同，但總算是把世人厭惡戰爭情緒包括在內了。這決議是符合於建立聯合國機構那些崇高的原則的。美國代表團雖然費盡心機，百般阻撓，最後也不能不站到贊成的一方面來。假如各國政府的領導人能够把聯大決議作為國內和國際政策的一部份，我們無疑地相信是會有助於和平的。這個決議是針對着美國國內的戰爭宣傳的。但，美國還可藉口「新聞自由」對這個決議實行怠工，正如美國把裁軍決議和禁用原子武器決議棄置不顧一樣。不久以後

的事實，就可以證明美國是否遵守聯大的決議，也可以在世人面前暴露到底是谁不要和平了。

自然，把爭取普遍和平的責任完全交與各國政府的領導人是大大不夠的。這必須補充以廣泛人民的支持。使聯大的和平決議在人民之間生根，茁壯，從而發揮無比的力量，使和平能够成為具體的事實，而不是抽象的觀念。

總結聯大第二屆會議的成果，我們可以得出下述三點結論：第一，英美集團妄想控制聯合國機構，從而摧毀這個機構，這個目的沒有完全達到。聯合國依然是維持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合作，制止侵略行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和平機構。第二，我們也不說這裏沒有一點危險，這個危險已經露其端倪，阻止這個危險是不容稍緩的。第三，祇要一切愛好和平的民主人士，加強他們的堅毅的決心與不斷的鬥爭，一切妨害和平的陰謀詭計是不會成功的。這些陰謀詭計最後是要遭到不可避免的破產的。

在本屆聯大開幕之初，美國就想發動攻勢，以爭取主動，最後是把聯合國變成帝國主義的御用工具。這個攻勢在一開頭就遭到悲慘的敗北，小型大會，巴爾幹邊境監察團和朝鮮委員會，被消息報記者佛隆斯基描寫成「設置三個類似死胎的機構而已」（全文譯載十一月廿九日上海時代日報）。蘇聯沒有參加小型大會，因為這個大會是企圖代替全體大會，並且是侵害安理會職權的，歸結起來就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蘇聯和波蘭沒有參加巴爾幹邊境監察團，烏克蘭沒有參加朝鮮委員會，因為它們認為這兩個機構對於希臘和朝鮮這兩個實際問題是不能貢獻什麼解決之道的；相反的，却會增加混亂。干涉內政，阻撓獨立，妨害任何自由民族的發展，終其極便是混亂。蘇聯等國堅苦奮鬥，最後雖然沒有阻止這兩個機構的成立，但却把英美集團帝國主義的野心向世人暴露無遺了。

不能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

我們不由得不起戰前國際聯盟失敗的經驗來了。國際聯盟的失敗，最低限度是由於：第一，英法集團始終要把這個和平機構當作一個反蘇工具，國際聯盟終於以反蘇開始又以反蘇終場了。第二，英法集團始終不相信國際聯盟處理和平問題（反對當時增長中的法西斯侵略勢力）的能力，並且盡量地麻痺它，它們最後找到了新的出路，那就是慕尼黑幽靈開始了蠱惑人心的一段黑暗的歷史。

自然，我們還不能說是聯合國已經完全走上了國際聯盟的覆轍，但危險的端倪已經露出。華萊士老早就提出了他的警告：「我記得清清楚楚，達拉第和張伯倫每一次企圖摧毀全世界反希特勒大團結的時候，都是在國際聯盟太薄弱的名目下進行的。我們不能再推毀我們的前途！世界不能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破壞今天聯合國的組織。」（「堅持聯合國的道路」，載「華萊士的呼聲」，梁純夫小魚合編，峨嵋版。）英美現在一方面以種種行動跨越聯合國，一方面却

盡量利用聯合國，把它們的政策戴上一個聯合國的帽子。這是一面二，二而一，目的總是不肯信賴聯合國，不去增強它的力量。所以，華萊士這樣地發問了：「如果聯合國薄弱，那麼，誰使它薄弱的呢？除了隸屬於它的國家而外，還有誰是聯合國家呢？它們究竟已經作了些什麼事情來使它變為強大的呢？」（同上）

聯合國和國際聯盟有許多不同之點，我們去比較國際聯盟和聯合國憲章便可以知道。不過，對於這兩個文獻，不是一般讀者所能閱讀的。我們要指出：聯合國最大的優點，就是五強都參加安理會，以大國一致原則去分担這個國際組織的任務。現在，英美企圖取消否決權，並且要把這個問題交與小型大會去研究，這不是要把這國聯所沒有的優點完全廢止嗎？英國前外長艾登出席舊金山會議歸來，向下院提出報告，他認為國聯失敗的原因之一，是「一國一票的概念使最爾一小國如 Liberia 可以和蘇聯同樣重要，Costa Rica 和英國可以有相等的

決定作用。這不是建立國際組織的健全基礎，因為這不是個真實的基礎。——（據英國國會記者J.E.D. Hill的敘述，載『工黨一年』第四章，費孝通史靖台譯，生活版。）現在，英，美，加，澳，墨西哥，菲律賓，阿根廷……忽然又在提倡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吵嚷着要求虛設的『民主』了。

小型大會就是以為這『民主』而建立的。它的主要任務就是取消否決權。否決權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絕不能限制或修改其中的一部份，而保留另一部份。限制或修改實際上就是取消否決權。中國在聯大的立場是主張限制否決權的，但它却要在對日和會上保留否決權。這是兩面政策，最後很可能統一到英美的立場上去，就是在對日問題上也不要否決權了。『文摘』一六一期有馮明章說明的『聯合國機構與小型大會』一文，可以參考。

法義人民沒有迷失道路

有關聯合國的參考資料實在太少

得可憐的。我們認為人民不關心世界局勢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所以，對於聯合國的工作是應該予以重大的關注的。

自然，認識聯合國不能單純地限於聯合國機構的本身。聯合國是直接處理世界問題的。因此，希臘問題有希臘問題的資料，朝鮮問題有朝鮮問題的資料，是可以分別加以研究的。我在這篇文章裏，自然不必一一加以介紹了。

認識聯合國的前途，首先要知道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今日美國外交政策最主要的表現當然是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畫。這一套辦法與聯合國的宗旨是完全相悖的。因此，聯合國的基礎也顯得鬆動了。關於這個問題，較新的文章是蘇聯評論家M. 馬里寧的『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畫』（譯文載時代雜誌二二三，二三四兩期。）

但，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畫是不會成功的，首先因為這是擴張主義的變相，所以蘇聯和新民主國家拒

絕參加。其次是華沙宣言把它潛藏在背後的政治陰謀完全揭穿。再後，法義兩國人民發出公開的反抗了。假如過去他們對美國的政策還認識得不够，還判斷得有欠明晰，現在應該是補正這個缺點的時候了。美國的命令已經直接發給喀斯貝里和許曼兩個反動政權，人民必須以團結的力量去反對外國的干涉者和國內的代理人。人民站到了鬥爭的前端，法西斯集團是沒有勝利的可能的。貝遜的『法義政潮透視』（『世界知識』十六卷廿二期）把兩國人民鬥爭所走過的道路以及兩國反動政權的應付方法，說明得最為詳細。再後幾天，還有杜明的『法義的緊張局面』（『時與文』二卷十三期），一直記述到十一月底高潮期間的情形。作者在文末以東歐和希臘的情形作對比的觀察，並且結語道：『法義兩國的人民在這樣現成的借鏡之下，難道還會迷失自己的道路麼？』法義人民沒有迷失道路；迷失道路的是喀斯貝里，史佛卓，薩拉蓋特，許曼，皮杜爾，戴高樂，賴馬

迪，勃魯姆……他們正在爲了美國主子的命令而屠殺人民，他們還說這是「中間路線」。世人還不明白這「中間路線」的真面目嗎？

爲聯合國的理想而鬥爭

蘇聯對聯合國機構的看法，是以不同的制度能够相互合作的一點出發的。它參加聯合國不是爲了去吵鬧的，而是爲了促進和平的。舉凡一切違反和平的事端，自然要猛烈地予以抨擊。在全體大會裏，在安理會裏，在各附屬機構裏，它都抱有這同一的宗旨。蘇聯以及新民主國家不參加小型大會，不參加巴爾幹邊境監察團和朝鮮委員會，並不是意味着退出聯合國。這幾個國家的代表還要坐在成功湖，繼續爲聯合國憲章崇高的原則而奮鬥，爲爭取普遍和平而奮鬥。假如它們退出了聯合國，那却正中英美下懷，聯合國變成了英美的世襲領地，它們可以安坐那裏爲非作歹，再也沒有別的國家去暴露它們了。假如蘇聯等國退出了聯合國，美國戰爭販子便

更會躊躇滿志，他們手裏的軍火工廠的股票便會大大看漲了。

當然，英美集團還是非常熱衷地想把蘇聯從現在的世界隔離開來，把蘇聯封閉到舊時代的孤立境地中去，然後它們便可以重覆十年前或廿年前的手法，暢所欲爲地干涉若干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了。

目前，這帝國主義復古式的企圖是無比的困難了。聯合國的一部憲章就是最好的保證，而蘇聯以及新民主

國家是以忠實於聯合國爲對外政策的重點之一的。

世界人民也不是十年或廿年前的人民了，他們在一次反法西斯的戰爭中贏得了勝利，就不容許在新法西斯的威脅下輸却這個勝利。反對美國獨霸政策，反對英法的尾巴外交，反對某些國家政府領導人的屈從行爲，正是維護聯合國憲章最重要，最偉大的鬥爭。

告定戶

本刊定戶日增，定戶來函更改地址或查詢者甚多，敬請諸君子以方便，來函時將定單號碼註明，俾便翻查，無任感荷。此啓。

生活書店發行部



康有爲與戊戌維新

胡繩

一 一個上書皇帝的年青人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十一月有一個秀才在北京「伏闕上書」——遞呈一封信給皇帝。秀才還沒有官銜，「上書」乃是越格的事。在這以前，在一八六二年，曾有過一個秀才上書皇帝，此後二十多年間沒有過這樣的事。現在突然發生了這件事，這個上書皇帝的廣東秀才康有爲的名字立刻在北京城裏傳遍了，雖然他這回上書並沒有到達皇帝的「御目」，因爲轉遞的大臣看到這奏文中的文字太「過火」了，恐防得罪皇帝，所以從中截留了。

一八八八年是在中法戰爭後四年。這時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的環攻下門戶早已洞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支配勢力已經確立，琉球、安南、緬甸這些所謂「藩屬」又相繼失去。滿清反動統治只是加強對內統治，而向外國侵略者妥協敷衍，以求苟安。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練海軍、創鐵路、設電報、辦工廠，拿這種粉飾門面的所謂「洋務」來欺騙人民，但廣大下層人民生活一天天更加苦痛，對統治者的不滿情緒已經鬱積很深。所以康有爲在他的第一次上書（即一八八八年的上書）中直率地（自

然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說：「強隣四逼於外，奸民蓄亂於內，一旦有變，其何以支？」他并責備皇帝和皇太后（慈禧太后）沒有積極「欲治之心」，所以沒有能把國家治好，所以他要求皇帝「下詔罪己」，「變法求治」，好好地選擇左右的官員，不要任用壞人，并且要廣開言路，使「臣下」都能進言建議。

康有爲，生於一八五八年，他的家庭是當地的豪紳望族，幼年時受了嚴格的傳統的儒家教育。廣東接觸西洋的事物最早，但少年的康有爲，克苦讀書，未必知道多少新知識。一八八二年，他入京投考，經過香港上海，很羨慕外國人的行政措施；當時上海已有許多外國書的譯本，講述世界大勢和工藝技術等等，他都買來讀了。一八八八年，他再入京應試，便有上書皇帝的這回事。考試既失敗，上書也不達，在北京住了兩年，廢然回鄉，到廣州、桂林各地講學，招收學生。他講些什麼學呢？他的學生梁啟超說是「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他牽強附會地託孔子學說之名來提倡變法的思想，又把他對西洋的政治與科學的

一知半解的知識比附起來。雖是在講學，他的政治野心是仍在活躍着的。

一八八八年的上書的內容已奠立了他的政治活動的方向。他是中國近代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的第一個人。他用貴族式的自命不凡的神氣宣說着他的改良主義思想，不免使許多拘守舊傳統的紳士官僚感到震驚；但在起初也不過把他看做是一個『狂生』而已。到了第一次上書後十年，他居然實際領導維新運動，想用政權力量來實行他的改良主義，守舊勢力就羣起而攻了。但是他的改良主義路線很快就失敗，一轉身間他已由改良主義者成為革命派的敵人，成為反革命的保皇黨領袖。到了辛亥革命後，他仍堅持復辟思想，一九一七年甚至與軍閥張勳合作擁戴已被廢的滿清小皇帝復位。這個政治改良主義者，在他一生政治活動的開端時期，雖然是代表着一種進步的趨向；但到他最後在一九二七年死掉的時候，已經引不起任何人的悼惜，因為人們只能覺得，這不過是一個舊時代的反動幽靈的幻滅而已。

但如果我們把康有為初期的政治活動與其後來的發展看做是各不相關的兩截，那就錯誤了。因為在他初期的改良主義政治活動中其實已經預伏着他後來的墮落的根源。在本文中所要指出的中心點就在這裏。

二 向『上面』和向『下面』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的中日之戰把滿清政府的

紙老虎全部拆破。一向用來向人民誇耀的新式陸海軍竟不堪『渺小』的日本的一擊而慘敗了。康有為這時又在北京應考，他約集了一千多個應考舉人，預備聯署上書給皇帝，反對簽訂屈辱的條約，主張遷都再戰，並變法自強。原稿是康有為起草，被稱為康的第二次上書。但聯名書還未上達，和約已經簽訂，參加者既都是為求功名富貴而入京的人，自然並無堅決鬥爭的意志，所以都走散了。於是康有為又把這份原稿修改一下，專談變法自強的一部分，以個人名義再送給皇帝，這是他的上皇帝第三書。

第三書總算到達了皇帝眼前，而且皇帝很加欣賞。這時康有為已考中舉人，又當了工部主事這一個小官。但以這樣小的職位還是不能有直接上書皇帝的權利，所以他接着又上第四書，仍被大官所阻攔。他這幾次書中的變法主張，概括說來，就是第三書中所說的『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廣言路，通下情而合其力』這三句話。但說來說去，他的辦法的實行還是要靠皇帝一人。他說：『夫中國人主之權，雷霆萬鈞，惟所轉移，無不披靡。』（第四書）『凡上所陳，其行之者乃在皇帝之一心。』（第三書）照他第四書所說，只要皇帝先下一『罪己詔』，并對大小官員，嚴行賞罰，并擢用新進人才，並下詔『求言』，那麼立刻就能『天下雷同，想望太平，外國變色，歛手受約矣。』於是就可放手實行種種『新政』（從改革官制到開礦修鐵路，振興工農商業等），『十年』就可使中國成為富強的大國了。

這自然還是傳統的「聖君賢相主義」，但究竟因為他攻擊了現行制度，並想用新的「人才」來摺掉舊的官僚，自然使舊官僚大起反感。在這些守舊派的阻梗下，康有為「一步登天」的期望不能實現，在京城裏做閒曹小官不是他所願意的。於是他在這年（一八九五年）十月又離開北京。

但這一年康有為在北京的活動使他從官僚士大夫中得到了不少朋友。中日戰爭刺激了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感到危亡可待，生怕如果不採取新辦法，難免同歸於盡。而康有為的主張正是從統治者立場提出的救亡圖存之道。康有為這時就和他的學生與同情者共同從事辦學會，辦報紙等。

照梁啟超後來的記載是：「此書既不克上達（即指第四書被從中截留），康有為以為望變法於朝廷，其事頗難，然各國之革政，未有不從國民而起者，故欲倡之於下。以喚起國民之議論，振刷國民之精神，使厚著其力，以為他日之用。」這正是改良主義政治運動的一般規律，他們只是在從「上面」碰了釘子，行不通的時候，才想到「下面」的「國民」。而且事實上，他們所能想到的國民，總究是脫不出官僚士紳的範圍的。康有為先在北京自己化錢出了一個「萬國公報」（日刊二千份），又組織「強學會」，參加的有數十人，袁世凱（直隸按察使）、文廷式（翰林院侍讀）列名其內。南洋大臣張之洞寄了五千兩給他做會費。康有為離開北京後，就到南京找張之洞，在

他支持下設立了強學會的上海分會。這個組織是學會的性質，所做的工作是研討「新學」，刊譯書報。

康有為在第四次上書中曾力言讓士大夫自由辦「學會」之利，希望由「上面」來提倡。他是要求「學會」能「合法」存在。但不料守舊派對這樣的溫和的集會也不能放心。在北京強學會成立四個月後，上海分會成立一個月後，就被「朝廷」下令查封。張之洞嚇得趕快申明退出會籍。「合法」的學會運動又受了挫折。康有為只好仍株守在他廣州的「萬木草堂」中作私人講學。但因這時中日戰爭後國內民間的情緒一般地是越來越不安定了，所以統治集團又覺得禁止士大夫的學會也不聰敏。不久後，便取消了禁令，而把北京的強學會改成「官書局」，使成為官辦機構，派大臣管理。康有為的學生們這才又在各地方活動起來，辦些報紙，學堂和學會來講究「新學」。

維新派在「下面」的這些活動，誠然也有極重大的歷史意義，客觀上確是中國人民覺醒過程中的一個表現，但是他們的活動的基本方向究竟是在「上面」而不在「下面」，所以一有機會，康有為又要到北京去「上書」，再去碰一碰「平步登天」的命運。

三 是誰看錯了？

一八九七年冬德國以武力強佔膠州灣。這是中日戰爭割台灣後又一重大事變，引起了中國國內極度震動。康有為連忙趕到北京，向皇帝上他的第五書。

這回他顯然是接受了以前上書的經驗，不作冗長的議論和新政項目的條舉，而極度強調地指出局勢的危急：「日本議院，日日會議，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分中國爲言。若箭在弦，當括即發。海內驚惶，亂民蠢動。……瓜分豆割，漸露機牙，恐懼四惶，不知死所。」他又直接了當地向皇帝說，照這樣下去，你皇帝的位子怕要做不成了。「恐自爾以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且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更報出下層人民已十分不滿，會起來作「亂」，拿來警告統治集團。「自台事後（即台灣割讓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固志，奸宄生心。……加以賄賂昏行暴亂於上，胥吏官差蹙亂於下。亂機遍伏，即無強鄰之逼，揭杆斬木（人民揭杆而起），已可憂危。」康有爲在這次上書中是淋漓盡致地說出了他的意思：現在的統治集團已太不行了，不被「強鄰」吞滅，就會被「亂民」推倒；因此就只有讓我來給你（以皇帝爲代表的統治勢力）挽救一下了。

守舊派勢力這時的確也已手足無措，一時控制不住這局面。年青的光緒皇帝這回是被這激昂的「忠臣」所感動了。他要總理衙門的大臣向康有爲詢問大計，並要康再專摺上陳，又索取康所著的書看。

這一來，康有爲的聲勢大振，官僚士紳中同情他的人較多了，自然也有許多人是完全以投機目的而和他合作。一八九八年三月，康有爲領導成立「保國會」。這個組織

比強學會進了一步，政治意義較強，其章程的第一條就說：「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爲保國會。」第一次集會情形，據梁啟超的記載是：「當時集者，朝官自二品以下以至言路、詞館、部曹及公車數百人，（這是說，到會的有二品以下的官吏和上京考試的舉人，實際數字，據梁在另一處又說是二百餘人。）樓上下座皆滿，康有爲演說時，聲氣激昂，座中有爲之下淚者。」這的確是康有爲的政治活動的極盛時期。

這正是帝國主義列強紛紛蠶食中國，而且盛傳着「瓜分中國」之說的時候。統治集團要想諱言危機已不可得，康有爲慷慨激昂地直說亡國的危險，自然能一時發生很大的影響。他是從愛國思想出發來打動他所認爲維新運動發動力的皇帝，也想用來打動他所向之呼籲的官紳士大夫。所以在他的保國會演說詞中，他以波蘭亡國爲先例提出警告說：「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爲其續矣。觀分波蘭事，脅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真可爲吾之前車哉。」這就是說，國如不保，則國主、貴臣、縉紳都將受脅受辱，失去特權地位，所以大家趕快來實行變法，以求保國罷。

但是康有爲用這套說法只打動了一個皇帝和一小部分的官紳士大夫。而光緒皇帝這時其實並不握有真實的大權，因爲還有一個慈禧太后在上面，而且朝廷的掌握實權